

# 儒學正統與士林評價： 比較陸隴其與湯斌從祀孔廟的歷史進程與評議

李蕙如\*

## 摘 要

清代儒學正統的建構與重塑，不僅是思想史延續的展現，更深刻反映了政治文化的作用與影響。本研究以陸隴其（1630－1692）與湯斌（1627-1687）兩位儒學大儒從祀孔廟的歷程為核心，探討清代儒學正統性的具體表現及其引發的爭議。透過分析士林對二人的評價，以及從祀過程中所涉及的政治因素，本文試圖揭示清代儒學正統的認定，如何在學術論辯、輿論壓力與政治力量的交織下被形塑與推動。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結合正史、奏疏文集及地方志等材料，考察二人的學術思想、社會聲望與政治支持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分析其入祀過程所涉及的朝廷決策與士林輿論。本文不僅聚焦於陸隴其與湯斌的個案比較，更進一步探討清代儒學正統性如何因應時代需求，並與國家政治目標緊密結合。藉此研究，期能深化對清代儒學正統性的理解，並揭示儒家思想如何在政治文化場域中獲得合法性。

**關鍵詞：** 儒學正統性、政治文化、從祀孔廟、陸隴其、湯斌

---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Literati Apprais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s of Lu Longqi and Tang Bin's Enshrinement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Li, Hui-ru\*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represented the continu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but also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orces. Focusing on the enshrinement of two eminent Confucian scholars, **Lu Longqi** (1630–1692) and **Tang Bin** (1627–1687),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Confucian orthodoxy in the Qing period and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its recognition.

By analyzing literati evaluations of these two scholars and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volved in their enshrinement, this paper seeks to reveal how the design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shaped and advanc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scholarly debate,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Methodologically, the study employs textu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drawing upon official historie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collected writings, and local gazetteers. It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scholars' intellectual thought, social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support, while also examining cour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literati discourse related to their admission into the Confucian Temple.

Beyo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s of Lu Longqi and Tang Bin,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how Qing Confucian orthodoxy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becam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state. Through this inquiry, the paper aim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onfucian orthodox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o illuminate the ways in which Confucian thought acquired legitimacy within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 Confucian Orthodoxy, Political Culture; Enshrinement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Lu Longqi, Tang Bin

---

\* \* Associate Professor, Tamkang University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一、前言

清代孔廟從祀制度是儒家禮制與國家政治交織的產物，其核心不僅在於尊崇儒學，更在於統治者藉由選拔入祀人物，來闡釋儒學正統、鞏固統治權威，同時也反映出其在漢化進程中的策略調整。因此，孔廟從祀不僅是學術地位的象徵，更是「遊走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跑馬競逐之場」<sup>1</sup>。本文以清初兩位重要儒者陸隴其與湯斌的從祀過程為切入點，探討清廷如何運用此一制度建構儒學正統，以及其背後所牽涉的學術思潮與士林輿論的複雜互動。過去對孔廟從祀的研究多側重於制度史或思想史的單一面向。然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士林輿論在清代政治文化中，如何塑造與詮釋儒學正統性。透過比較陸、湯兩人的從祀歷程，試圖討論清代不同思想取向與政治力量之間的角力。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其一，陸隴其與湯斌從祀過程中的主要爭議何在？其二，士林對二人從祀的態度如何反映儒學正統的多元詮釋？其三，清廷如何運用從祀制度來建構儒學正統，並調和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與討論議題相關的研究舉隅如下：

### （一）孔廟從祀的研究取向：政治權力或儒學正統？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sup>2</sup>與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sup>3</sup>等專著，提供了理解孔廟從祀制度的重要視角。黃進興認為，孔廟從祀本質上是國家權力建構正統的重要工具，因此政治因素具有決定性。朱鴻林則凸顯地方仕紳在推動從祀中的作用，較重視地方士林與鄉約文化對從祀形成的推動作用，強調地方學術共同體的重要性。二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偏重國家權力，後者則強調地方士人的文化力量。然而，兩者皆未深入比較士林評議與朝廷裁決之間如何互動，亦未以具體人物比較其運作模式，本文即擬由陸隴其、湯斌兩案加以檢討。

### （二）陸隴其與湯斌研究的主要觀點

#### 1、陸隴其研究

現有關於陸隴其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三個面向：第一，探討其朱子學思想及其學術定位；第二，分析其學術思想與清廷政治需求的關係；第三，論述其理學精神在政治實踐

<sup>1</sup> 吳旺海：〈學術競逐與帝王心態：清儒陸隴其從祀孔廟蠡探〉，《朱子學研究》第40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

<sup>2</sup>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

<sup>3</sup>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上的展現。不同研究雖各有側重，但多集中於單一面向，較少整合思想、政治與從祀制度三者之互動。

第一類研究主要關注陸隴其在清初朱子學復興中的地位。葛榮晉(1935-2023)主編《中國實學思想史》認為，陸隴其是清初「尊朱黜王」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契合清廷尊崇程朱理學的政策方向。<sup>4</sup>龔書鐸(1929-2011)主編《清代理學史》則指出，陸隴其雖以程朱理學為宗，但並非流於空談，而是將理學建立於「實事」「實政」之上，展現清初理學重視經世實踐的特色。<sup>5</sup>另一方面，張天傑則從思想發展史切入<sup>6</sup>，探討陸隴其由王學返歸朱學的心路歷程，說明其尊朱立場並非一開始即已確立，而是在長期思想轉化中逐漸形成。

第二類研究則強調陸隴其思想與清廷政治需求之間的關聯。黃聖修指出<sup>7</sup>，陸隴其兼具學術上的「正確」與政治上的「清白」，因此成為雍正朝增祀孔廟的重要人選。孟祥才亦認為<sup>8</sup>，陸隴其尊朱抑王的理論適應清廷建構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因此得以被塑造成「千秋理學正宗」，並最終從祀孔廟。孫經超則進一步歸納陸隴其得以配祀文廟的三項因素<sup>9</sup>，包括理學思想符合官方需求、積極從政以及人格操守高潔。

第三類研究則重視陸隴其如何將理學落實於治政實踐。余龍生、張文革認為<sup>10</sup>，其治政理念可概括為「理學為宗、民生為本、清廉為先」，展現朱子學由倫理理念轉化為行政實踐的特色。單智偉、陳勇則置於清初朱王之爭的背景<sup>11</sup>，討論陸隴其如何以「實學」重新詮釋朱子學<sup>12</sup>，以回應王學的挑戰。楊菁則較全面整理其心性論、工夫論、道統論與論學思想，但對其思想形成背景及與清初政治環境的互動著墨較少。

綜觀上述研究，學界對陸隴其的討論已有相當成果，主要集中於其朱子學思想、政治功能及治政理念等面向。然而，現有研究多將陸隴其視為個別人物加以考察，或聚焦其思想內涵，或強調其政治意義，較少進一步探討其從祀孔廟的歷史進程，以及士林推舉、朝廷裁決與學術評價三者如何共同作用，促成其儒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尤其缺乏與同時代另一位從祀名臣湯斌的比較研究，因此仍難全面說明清初儒學正統建構的具體機制。本文即

<sup>4</sup> 葛榮晉主編：〈明清之際實學思潮的高漲與朱子學的復興〉，《中國實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447。

<sup>5</sup> 龔書鐸主編：《清代理學史》上卷，頁169-185。

<sup>6</sup> 張天傑：《尊朱辟王思潮與明清學術轉型：道、學、政之間的程朱陸王之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

<sup>7</sup>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sup>8</sup> 孟祥才：《曲阜廟域與中國儒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326。

<sup>9</sup> 孫經超：〈陸隴其配祀文廟探析〉，《文化學刊》第7期，2017年7月，頁207-210。

<sup>10</sup> 余龍生、張文革：〈清初理學名臣陸隴其的治政思想評述〉，《朱子學刊》第一輯，2004年，頁323-331。

<sup>11</sup> 陳勇：〈清初“朱王之爭”與陸隴其對朱子學的“實學”詮釋〉，《朱子學研究》第1期，2023年。

<sup>12</sup> 楊菁：〈廓清學術的健將—陸隴其及其思想〉，《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出版社，2008）。

擬透過陸隴其與湯斌兩案的比較，重新檢視士林評議、政治權力與儒學正統建構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 2、湯斌研究

湯斌作為明末清初的重要儒者，其學術思想兼具理學傳承與經世實踐特色，不僅主張以程朱理學為本，亦不拘泥於門戶之見，嘗試調和程朱與陸王兩系，反對明末空疏學風，倡導經世致用，因此在清初學術轉型中具有重要地位。

綜觀目前學界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向。第一，生平事蹟與文獻整理。趙秀紅〈湯斌研究綜述與展望〉<sup>13</sup>指出，相關研究多集中於湯斌家世、生平經歷及著作版本整理，為後續思想研究奠定基礎。第二，思想內涵與經世理念。王珂〈湯斌的思想淵源和實踐〉<sup>14</sup>、鄭穎貞〈湯斌哲學思想初探〉<sup>15</sup>及賴玉芹〈論湯斌的學術思想及成就〉<sup>16</sup>等，主要探討其理學思想、經世觀念及其在清初實學思潮中的定位，普遍認為湯斌能兼顧義理與實踐，是清初儒學由空談轉向經世的重要代表。第三，地方治理與教化實踐。蔣竹山〈湯斌禁毀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擊通俗文化的個案〉<sup>17</sup>、李恬〈湯斌革除淫風廣施教化述論〉<sup>18</sup>等，則從地方治理、民間信仰及社會教化切入，說明湯斌如何將理學理念落實於施政之中，並藉由整頓地方風俗與禁毀淫祀，展現其重建社會倫理秩序的政治實踐。

然而，上述研究多半著重於思想史或地方治理史的角度，較少將湯斌置於孔廟從祀制度與清代儒學正統建構的脈絡中討論。例如高安澤〈清朝名臣從祀孔廟之湯斌和張伯行〉<sup>19</sup>僅概述湯斌、張伯行二人之行誼，重點仍在人物介紹，對從祀形成的歷史背景及政治文化意涵著墨有限。此外，由於張伯行(1662-1725)<sup>20</sup>與湯斌同屬河南士人，相關研究亦多以

<sup>13</sup> 趙秀紅：〈湯斌研究綜述與展望〉，《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3期，2020年，頁97-101。

<sup>14</sup> 王珂：〈湯斌的思想淵源和實踐〉，《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2005年，頁29-31。

<sup>15</sup> 鄭穎貞：〈湯斌哲學思想初探〉，《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2004年，頁29-30。

<sup>16</sup> 賴玉芹：〈論湯斌的學術思想及成就〉，《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06年，頁12-14。

<sup>17</sup> 蔣竹山：〈湯斌禁毀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擊通俗文化的個案〉，《新史學》第6卷第2期，頁67-112。文中深入探討了湯斌在文化整飭方面的具體措施與影響，展現了清初士大夫如何應對通俗文化挑戰，文中指出湯斌禁毀五通神使得他的民間形象漸被神化，相關內容也見於《清朝野史大觀》、《耳郵錄》等野史筆記小說。

<sup>18</sup> 李恬：〈湯斌革除淫風廣施教化述論〉，《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8年，頁124-126。

<sup>19</sup> 高安澤：〈清朝名臣從祀孔廟之湯斌和張伯行〉，《中原文獻》第17卷第3期，1985年。

<sup>20</sup> 張伯行（1662-1725），字孝先，號恕齋，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清史》本傳稱其「生平學宗朱子，篤信謹守，無稍依違」，其人在《近思錄集解·序》：「伯行束髮受書，垂五十餘年，兢兢焉以周、程、張、朱為標準，而於朱子是錄，由服膺弗失。」張伯行奉朱學為聖學，居官清正廉明，康熙帝稱其為「天下清官第一」、「操守雖好，而辦事多糊塗執拗之處」，於福建巡撫任內刊刻《學規類編》、《養正類

地域因素作為比較基礎，而較少探討其與浙江儒者陸隴其在從祀歷程上的異同。

目前直接比較陸隴其與湯斌者並不多見，其中以三浦秀一〈湯斌と陸隴其——清初士大夫の人間理解と經世意識〉<sup>21</sup>最具代表性。該文主要從經世意識與人性理解比較二人的思想特色，指出二人雖同為清初理學代表人物，但在人性觀與治世理念上仍存在差異，對理解清初士大夫思想具有重要啟發。然而，其討論焦點仍偏重思想史層面，尚未進一步分析兩人在孔廟從祀過程中，士林評議、官方裁決及儒學正統建構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綜上所述，現有湯斌研究已累積豐富成果，但主要集中於理學思想、經世理念與地方治理等議題；至於其從祀孔廟所涉及的政治考量、士林評議及官方決策機制，仍缺乏系統性的討論。尤其缺少將湯斌與陸隴其並置比較，藉以探究清代儒學正統如何透過從祀制度形成的研究。本文即擬以二人從祀歷程及其士林評價為核心，重新檢視政治權力、學術論辯與儒學正統建構之間的互動關係。

### （三）清代儒學正統建構的研究

近年有關清代儒學正統建構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兩種理解方向。第一種認為，清初學術主要是由晚明思想向清代實學轉型，其焦點在朱學與王學之間的重新定位，如：鹿博《晚明清初儒學轉型研究》<sup>22</sup>從朱子學的詮釋路徑、陽明心學境界訴求的衍化等方面，討論主體性思維的遷轉與道德性命學的衰頹。第二種則強調清代程朱理學並未因漢學興起而式微，而是在孔廟從祀、官方祀典與士林評議等制度中持續重建其正統性，如丘文豪《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sup>23</sup>，則是從清中晚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變化出發，結合「朱陸異同」的持續論辯，指出程朱學者群體對於陸王心學及事功風氣的強烈批評。他們以「性即理」為政教秩序的根基，強調「體」與「用」的區分，並矯正時人過度偏重事功與陽明學「有用之學」的思潮。<sup>24</sup>此一觀點突破了將清代思想僅歸納為「漢學與經世並立」的詮釋框架，揭示出理學群體如何在孔廟從祀與士林評價中重申程朱

編》、《道統錄》、《正誼堂文集》等，傳承朱學不遺餘力。其人認為程朱之學為入聖門之途徑。對程朱一派的書籍的輯刻與整理用力極深，匯集成《正誼堂全書》三百七十五冊，統理出儒學道統的傳遞關係，以「明聖賢之宗傳」、「端蒙養之教」、「正為學之模」為思想的宗旨。光緒初年，從祀孔廟。

<sup>21</sup> 三浦秀一：〈湯斌と陸隴其——清初士大夫の人間理解と經世意識〉，《文化=Culture》第48期，（仙台：東北大學文學會，1984），頁74-92。

<sup>22</sup> 鹿博：《晚明清初儒學轉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

<sup>23</sup> 丘文豪：《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21。

<sup>24</sup> 詳見丘文豪論文第六章〈嚴格化程朱理學的實踐與影響〉第三節〈孔廟從祀標準嚴格化〉，氏著：《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臺灣：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21），頁226-229。

理學正統標準的重要性。與此相呼應，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sup>25</sup>則從宏觀角度分析晚清理學的發展脈絡，指出理學雖於清中期一度受漢學壓制，但並未斷絕，且在近代一度出現「中興」。書中對嘉道時期的理學衰微與復熾、咸同時期的中興及光宣以降的再度衰落均有系統性梳理，並論及程朱與陸王之間的調和與爭辯。

兩種研究雖皆指出程朱理學的重要性，但前者偏重思想演變，後者偏重制度建構。至於制度如何透過具體人物從祀而形成儒學正統，尤其士林評價與朝廷裁決如何互動，目前仍缺乏深入比較研究。本文即以陸隴其與湯斌兩案為中心，進一步探討兩人從祀歷程中政治力量、士林評議與儒學正統建構之互動。

在研究方法與學術取徑上，本文採取歷史文獻分析法，並以學術史與政治文化史之視角，運用《清實錄》、《大清通禮》、《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禮部則例》、《國子監志》、《山東通志·闕里志》、金之植等所輯《文廟禮樂考》、龐鍾璐《文廟祀典考》、藍鍾瑞《文廟丁祭譜》、陳錦《文廟從祀位次考》、郎廷極《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牛樹梅《文廟通考》等，以及《陸隴其年譜》、《湯斌年譜》為核心依據，探究陸隴其與湯斌從祀孔廟的歷史進程及相關問題。全文主軸有二：一為「官方儒學正統的建構」，一為「士林評價的形成與互動」，比較兩人在學術定位、道德形象及政治象徵上的異同，以探討清代從祀制度背後所呈現的學術與政治意涵。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目前孔廟從祀研究已累積制度史與禮制史成果，陸隴其與湯斌研究亦多集中於思想特色、學術定位及治政實踐。然而，現有研究較少將兩人置於相同分析架構下，比較其從祀孔廟之形成過程，亦較少探討士林評價、地方推舉、官方決策與政治需求之間的互動關係。此外，關於清初理學正統如何透過孔廟從祀制度獲得制度化建構，以及官方如何藉由從祀回應不同時期學術思潮與政治需求，仍有進一步討論空間。因此，本文以陸隴其與湯斌為比較對象，結合祀典制度、士林輿論及官方決策三個層面，重新檢視清代儒學正統建構的歷史機制。

## 二、清代從祀孔廟的歷史與文化意涵

清代祀典制度是儒家禮制與政治權力深度交織的產物，尤其在孔廟從祀一環，其對入祀儒者的選擇，不僅反映了清廷對儒學傳承的認定，更蘊含著深刻的政治考量。清廷肇興之初，為了鞏固統治和彰顯正統性，在繼承明朝祀典制度的基礎上，選擇「無制作」，「遵

<sup>25</sup>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舊典，遣祀闕里，示天下所宗」<sup>26</sup>，在祀典的體系上以及祀典的細微處模仿明制，沿襲歷朝分立學統之祀與道統之祀。

康熙（1661-1722）、雍正（1722-1735）以降，清廷持續改革孔廟祀典，包括提升祭孔規格<sup>27</sup>以及重申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sup>28</sup>。此一系列制度改革，不僅彰顯朝廷尊崇儒學的政治姿態，更反映官方藉由孔廟祀典重塑學術正統、整合士林的政策方向。換言之，從祀孔廟已非單純的禮制安排，而是學術評價、政治教化與文化治理交互作用的結果。

雍正二年除了重新定明嘉靖年間被罷祀者，從祀孔廟宜復祀者外，另增祀者陸隴其等二十人<sup>29</sup>。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年大規模調整從祀名單，並非僅是延續康熙朝未竟之議，也不能單純理解為打破「本朝人物不得從祀」的既有慣例，而是與雍正即位初期的政治情勢密切相關。雍正帝繼位後，由於皇位繼承過程引發諸王競逐與社會輿論質疑，其統治初期面臨正統性的挑戰，因此亟需藉由尊崇儒學、重申道統，以爭取漢人士大夫的支持。在此背景下，透過重新調整孔廟祀典、增祀理學名儒，不僅彰顯朝廷尊奉程朱理學的立場，

<sup>26</sup> 《清實錄·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sup>27</sup> 清康熙仿效漢制，首創皇帝東巡祀孔之制，並以「三跪九叩」的臣禮親祀先師，此為歷代帝王祭孔禮節之最。康熙帝不僅修訂完善祭祀儀式與禮樂規格，更創立告祭與獻功之制，將軍功告於孔子，藉此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康熙九年（1670），清聖祖頒布了以「文教為先」為核心的〈聖諭十六條〉。清康熙「聖諭十六條」或受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聖諭六言」啟發及影響，頒發用以覺世牖民的教化綱領：「我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雍正帝（1722-1735）則在康熙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改革。他將皇帝「幸學」改為「詣學」，追封先師五代王爵，定「聖誕致齋，聖諱敬避」之制。在祭祀儀注中明確皇帝親自跪獻，強調其對孔子的尊崇超越君臣之禮。這不僅是禮儀上的微調，更是將尊孔置於尊君之前的明確姿態，這或許也是因為孔子之教有助於安邦定國之故。雍正二年（1724）頒布了〈聖諭廣訓〉，其中建立了定期宣講的制度，闡述了「黜異端以崇正學」的理念。相關資料可參考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收於呂妙芬主編：《明清思想與文化》（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頁387-414。文中說明朝廷規定的宣講聖諭，也討論民間以善書教化社會的宣講拾遺，不僅關注教化管道的傳播與形式，也討論宣講形式在社會不同場域中被不同群體轉化運用的事例。此外，雍正三年（1725）二月丁丑，遣「實心為國」、「操守亦甚清廉」的果郡王進行釋奠，「與唐制所傳宰輔釋奠相比，宗室祀孔意味著承祭者級別更高，與此同時，所遣宗室地位極重，更突出祀孔日隆。」。詳參《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雍正三年八月壬辰；馮振亮：《清代祀孔典制變遷的歷史考察》，（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8），頁35。

<sup>28</sup> 康熙五十年（1711年）將朱子升為十二哲，亦是重塑學術正統的重要舉動。此一時期，嚴若璩（1636-1704）、朱彝尊（1629-1709）等儒者紛紛提出改革建議，尤以爭取漢唐傳經之儒入祀孔廟為主要訴求。康熙四十二年（1703），嚴若璩撰《孔廟從祀未議》，爭取增祀孔門弟子，以完整傳衍之譜系；朱彝尊謂：「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於經義僅涉略而已。」慨歎經學式微，歸咎朱熹編《四書》造成士子不求本末、斷章取義。見氏著：〈經書取士議〉，《曝書亭集》卷60，頁3-4。

<sup>29</sup> 計有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尹焞、黃榦、陳淳、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隴其。

也向士林宣示新政權承續儒家道統、以教化天下的政治理念。陸隴其一生尊朱辟王、操守清廉，兼具理學典範與道德楷模的形象，因此得以在雍正二年列入增祀名單，實反映了政治需求與學術正統相互結合的結果。雍正帝直指「先儒崇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sup>30</sup>，當時禮部所議不甚允協者，如「戴聖、何休未為醇儒」；「鄭眾、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陸贄與韓琦「事君以誠，立身以正，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sup>31</sup>雍正四年（1726年），他首次開創皇帝親祀制度，此後親祀丁祭正式成制。此外，雍正帝還首創宗室祀孔之制，派遣宗室親王進行釋奠，顯著提升了祀孔活動的規格與地位。據《實錄》所載：

祭先師孔子，上親詣行禮。祭畢，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卓曰：儀注內開獻帛進酒，皆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可記檔案，以後照此遵行。<sup>32</sup>

此後皇帝親祀丁祭正式成制。<sup>33</sup>此一時期，程廷祚（1691-1767）、杭世駿（1696-1773）、全祖望（1705-1755）等儒者提出的增祀建議<sup>34</sup>，也反映了學術界對儒學正統標準的持續辯論。

乾隆帝（1735-1796）多次東巡祭孔，並在各地興建文廟，進一步將祀孔典制推向高峰。然而，自道光朝以降，清廷內外交困，祀典制度也隨之衰敗，其象徵意義逐漸形式化。晚清時期，儘管清廷試圖通過將祀孔典制升格為大祀以挽救治統，但仍未能扭轉其逐漸式微的局面。

清代祀典制度的演變，不僅是禮制上的調整，更具深遠的政治與文化意涵。<sup>35</sup>首先，祀典制度是清廷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透過祭孔，清廷宣示其對儒家文化的認同，藉此向漢族士人彰顯其統治的正當性。特別是雍正時期，派遣「實心為國」的親王進行釋奠<sup>36</sup>，

<sup>30</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00。

<sup>31</sup> 以上引文皆出於[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00。

<sup>32</sup> 詳參《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7，雍正四年八月（1726）丁卯。

<sup>33</sup> 除丁祭外，世宗亦有兩次親祀記錄：雍正二年，闕里孔廟火災，世宗親詣國子監文廟告祭；雍正七年，闕里文廟修葺完工，適有慶雲祥瑞出現，世宗亦親詣國子監文廟告祭。詳參《國子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sup>34</sup> 詳見程廷祚：〈聖廟從祀議〉，《青溪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卷5，頁724-727；杭世駿〈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議〉，《道古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426，卷23，頁429；全祖望〈前漢經師從祀議〉，《鮚埼亭集外編》，收入《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冊，卷39，頁1548-1549。

<sup>35</sup> 馮振亮：《清代祀孔典制變遷的歷史考察》，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8年，頁1。

<sup>36</sup> 同前注，頁35-36。

此舉將儒家儀式與政治忠誠緊密結合，凸顯了統治者對儒學的權威性詮釋。再者，祀典制度是清廷推行儒家文化的核心途徑。藉由祭祀活動，清廷積極倡導儒家倫理道德，強化了社會的倫理秩序與道德規範。在清代，選擇哪些儒者從祀孔廟，成為一項至關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如《清史稿》史臣論曰：「清世以名臣從祀孔子廟，斌、隴其、伯行三人而已」<sup>37</sup>，顯示清代對從祀名臣之選擇標準與其在學術上的「正確」與政治上的「清白」密切相關。另則，正如張壽安所言<sup>38</sup>，清代儒者「打破道統、重建學統」的目標，使孔廟祀典成為學術界爭議的焦點。清代對從祀制度的改革，反映了官方對學術正統的認定，並藉由制度化手段，引導儒學思想朝向經世致用與嚴格化程朱理學的方向發展，這也是理解陸隴其與湯斌從祀的關鍵背景。

### 三、陸隴其從祀孔廟的歷史進程與評議

#### (一) 陸隴其聲望形成與從祀基礎

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專以程朱為宗」<sup>39</sup>，清康熙九年（1670）進士，歷任江南嘉定知縣、直隸靈壽知縣、都察院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等職，清廉自守，勤政愛民。著有《問學錄》、《讀朱隨筆》等，後經張伯行收入《正誼堂全書》<sup>40</sup>，成為清初朱子學的重要典籍。其著作雖以闡揚朱子學為主，少有創新體系，但對程朱道統的維護極具代表性，亦為其日後獲得官方高度肯定的重要基礎。

#### 1、學術路徑的轉折與「尊朱辟王」思想的確立

據《年譜》記載，陸隴其早年「粗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觸其部。自庚戌以來，乃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sup>41</sup>其思想基礎更多來自明代流行的《四書》講章。順治十五年（1657），二十八歲的陸隴其因

<sup>37</sup>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標點本），卷265〈列傳五十二〉，「論曰」。

<sup>38</sup>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頁53-111。

<sup>39</sup>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下），卷47，頁1327。

<sup>40</sup> 《問學錄》成書於康熙十一年（1672），乃陸氏問學思考心得，亦為中年學術傾向趨於明晰的代表之作。後由張伯行收入《正誼堂全書》，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付梓刊行，但非全本，張伯行編刊此書時於卷中特刪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問學錄·原序》，頁1）。另有光緒十六年（1890）許仁沐主持編刊之《陸子全書》所收《問學錄》，較正誼堂本多出許多內容。

<sup>41</sup>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391-392。

科舉不得志而發憤讀書，並耗費六年增訂《四書大全》，廣泛涉獵林希元《蒙引》、蔡清《存疑》等明代註疏。<sup>42</sup>由此可見，其尊朱思想最初是從明代講章學入手，而非直接源於程朱原典。這也讓錢穆在〈陸稼書學述〉中質疑，陸氏不過是「明末之講章家言」<sup>43</sup>，「非能有深見」<sup>44</sup>，並認為其「持門戶之見特深」<sup>45</sup>，僅止於「一種四書之學」<sup>46</sup>。

在朱王學術間徘徊的陸隴其<sup>47</sup>，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結識朱子學者呂留良（1629-1683），受呂氏的學術影響，方才成為朱學篤信者。陸隴其在〈祭呂晚村先生文〉中自述，在與呂留良會晤之前，其思想「糠粃雜陳，玦玦並列，反生淆惑」<sup>48</sup>，正是呂留良的「從容指示」，才使其尊朱之志「始堅，不可復變」<sup>49</sup>。錢穆也指出，陸隴其後來的言論「頗有蹈襲晚村」<sup>50</sup>。由此可知，呂留良對陸隴其思想的影響至關重要。然而，這條「尊朱辟王」的路徑在康熙朝的政治語境下，卻是一把雙刃劍。陸氏承襲張履祥（1611-1674）、呂留良思想，本帶有強烈的明遺民史觀與反清隱憂，陸隴其將明亡之因歸咎於王學敗壞學術，表面上是純粹的學術辨析，實則將遺民學者具有抗爭性的理學，轉化為強調尊程朱、守綱常、維護大一統秩序的臣民之學。

陸隴其不僅身體力行地宣揚朱學，更透過校訂、刊行多部著作來確立朱子學的正統地位。他曾修訂明儒陳建的《學蔀通辨》與時人張烈<sup>51</sup>的《王學質疑》，並廣贈友人，以藉此批判陽明心學的空疏流弊<sup>52</sup>。他還校訂了元儒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鼓勵士人按朱子

<sup>42</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頁22。

<sup>43</sup> 錢穆：〈陸稼書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頁188。

<sup>44</sup> 《年譜》。

<sup>45</sup> 同前注，頁207。

<sup>46</sup> 同前注，頁207。

<sup>47</sup> 陸隴其曾言：「三十以來，始沉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見陸隴其：〈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三魚堂文集》卷8，《陸子全書》第一冊（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398。

<sup>48</sup> 《年譜》，頁94-95。

<sup>49</sup> 同前注，頁94-95。

<sup>50</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頁78-79。

<sup>51</sup> 張烈（1622-1685），字武承，號孜堂。順天府大興縣（今屬北京市）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授內閣中書。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名列一等，授翰林院編修，參與《明史》編纂。陸隴其好友，兩人學術志趣相同，曾與毛奇齡辯論。著有《王學質疑》、《孜堂文集》二卷、《讀易日鈔》六卷。

<sup>52</sup> 陸隴其在《王學質疑》序謂：「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掃龍溪、海門之毒，而凡梁溪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嘉靖中廣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為刊之，今並附呈。見[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頁190、161。有研究指出，「他（陸隴其）強烈主張將朱子學獨尊為正學，將陽明學等貶斥為異學，並試圖仿照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做法借助朝廷的政治力量來實現獨尊朱學、消滅異學的目的。」見孫寶山：《明清儒學比較研究：黃宗羲與陽明學》（北京：宗教

的方法讀書。他明確區分「立教之弊」與「末學之弊」<sup>53</sup>，全力為朱學流弊辯護。<sup>54</sup>因此，陸隴其尊朱辟王並非單純學派之爭，而是將程朱理學視為維繫政治秩序與社會倫理的唯一正統。此一學術立場，使其形象符合清廷整肅學風、重建正統的政治需求，也成為日後從祀孔廟的重要思想基礎。

## 2、以德化民的為官實踐

陸隴其的思想不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更體現於他的為官實踐。他在康熙年間曾先後擔任嘉定、靈壽知縣，最終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

康熙十四年(1675)，陸隴其任江南嘉定知縣，面對「富者競奢侈，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sup>55</sup>的民情，他敦行教化，主張「重整倫理綱常、道德規範」。反對強徵賦稅，代之以掛比法與甘限法，體現恤民愛民的理政理念。<sup>56</sup>康熙二十二年(1683)任河北靈壽知縣，針對因貧困不能按時交納賦稅者，則用個人薪俸代繳，另著手減役、整頓治安，改善當地鬥狠、賭博的惡習劣風。此外，為避免重文輕行，陸隴其「每朔望詣學，與之講解《四書》，勸其將聖賢道理，躬行實踐。」<sup>57</sup>

陸隴其的思想門戶之見，除了體現在其學術著述中，也貫徹於他的為官實踐。擔任靈壽知縣期間，修訂傅維樞<sup>58</sup>編纂的《靈壽縣志》時，他明確提出陸象山九淵、陳白沙獻章、王陽明守仁三先生的學說「近乎禪」<sup>59</sup>，對三位從祀者入祀孔廟的資格提出異議，此一舉動，展現其嚴守朱學道統的堅定立場。

文化出版社，2014），頁 16。此處應澄清的是：陸隴其固然尊朱，但是否藉助政治力量達到目的，此則值得商榷。

<sup>53</sup> 〈學術辨〉：「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其末學哉！」詳見〔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影印清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頁 108。

<sup>54</sup> 相關資料可參見張天傑：〈清初理學家的「由王返朱」心路轉換〉，《陽明學刊》第 7 期，2015 年。

<sup>55</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40。

<sup>56</sup> 陸隴其反對當時常用催科方式強徵百姓交稅，主張以引導勸諭的方式為之：「錢糧者，朝廷之國課非縣官之私蓄，而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做好事，以加於百姓。」是故，徵收賦糧時，制訂掛比法和甘限法：欠繳者張榜公佈，督促自清，不派阜隸強收；難以交齊者，分批限期交完，逾期未完則甘願受罰。相關資料可見〔清〕趙爾巽：《清史稿·陸隴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sup>57</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06。

<sup>58</sup> 傅維樞（1643-1722），字培吾，號霄影，靈壽人。編有《靈壽縣志》，共十二卷，計有封域志、建置志、祀典志、貢賦志、天文志、官師志、人物志（7-9 卷）、藝文志（10-12 卷）。

<sup>59</sup> 陸隴其謂：「按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年增入陸象山九淵，萬曆十二年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守仁三先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乎禪，與孔門之旨不免齟齬，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為善學三先生者。」〔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 150。

康熙二十九年（1690），陸隴其擔任四川道監察御史，上疏請免「畿輔」地區舊欠<sup>60</sup>，雖起初不為部議所容，最終仍獲准。他更因反對捐納制度而多次上奏，陸續有〈捐納保舉議〉、〈復議捐納保舉〉、〈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甚至提出要稽查考核捐納之官，卻引發同僚反彈，最終告老還鄉。陸氏家族素以廉潔著稱，「三魚堂」典故即象徵其清廉家風。<sup>61</sup>此種家學傳承，不僅塑造其個人政治人格，也成為後世推崇其道德形象的重要來源。相較於其學術創新有限<sup>62</sup>，朝廷與士林更重視其道德實踐與人格典範，<sup>63</sup>此亦是其最終得以從祀的重要原因。

## （二）士林推舉與朝廷裁決：制度與權力的交匯

陸隴其從地方名宦走向文廟配享的歷史進程，絕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到地方士紳、朝廷保守派官僚與帝王意志三方的角力。

康熙三十二年（1693）陸氏卒後，地方官民發動了第一波努力。平湖知縣呂猶龍<sup>64</sup>、學博謝師昌<sup>65</sup>等人以其「學術人品俱極醇正」為由，詳請崇祀鄉賢祠。學院鄭開極<sup>66</sup>的批文中，明確肯定了陸隴其在學問與施政上的雙重成就：「學本程、朱，政兼召、杜」<sup>67</sup>，認為其闡揚精微理學、布施惠政的功績，足以成為後世儀範。之後，嘉定諸生亦主導其入祀名

<sup>60</sup> 陸隴其論及「百姓甚苦，輔臣不得已題請秋後代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喜能堪也。」詳見〔清〕陸隴其：〈畿輔民情疏〉，《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17-19。

<sup>61</sup> 陸隴其的多項政策體現了體恤百姓的精神，他最著名的政績是清廉作風，認為：「夫使天下皆廉吏，則自能撫甯以原民生，而錢糧可以無缺，敷教以善民俗，而盜案可以永清，故興獎廉吏，即所以為錢糧盜案計，法誠善也。」詳參〔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卷117，頁528。又，陸隴其六世祖春坡公為感念父親盛德之祐，特築三魚堂以示子孫，亦可見代代相傳之清廉家風。可參見〔清〕彭潤章：《光緒平湖縣志·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82。

<sup>62</sup> 如清儒李光地曾指出：「陸稼書清品，讀書又正，只是少思，便精采少。請教他甚多，都無發明。」相關資料參見李光地：《榕村全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sup>63</sup> 當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康熙帝本因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清潔」，可代其任，後得知其人已故，也不禁慨歎：「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詳參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9，收於〔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48。

<sup>64</sup> 呂猶龍，初任浙江驛鹽道，1718年任福建巡撫，1722年任浙江巡撫，事蹟具〔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284。

<sup>65</sup> 謝師昌，康熙間貢生，康熙二十年（1681）授平湖訓導。

<sup>66</sup> 鄭開極（1638-1717），字肇修，號幾亭，侯官縣（今福州市）人。清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康熙二十年（1681）主纂《福建通志》，共64卷。

<sup>67</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97-198。

宦祠，地方督撫宋榮<sup>68</sup>、許汝霖<sup>69</sup>隨即推波助瀾，在批文中給予「思希曾、閔；存誠主敬，力紹程、朱」<sup>70</sup>的極高評價。這一步是地方士紳試圖透過表彰循吏與理學家雙重典範，來向中央爭取話語權的集體展現。

然而，當這股地方聲浪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嘉興郡守吳永芳首度轉化為請祀文廟的具體提案時<sup>71</sup>，隨即遭到了朝廷體制的拒絕。浙江撫院徐元夢<sup>72</sup>等於覆議中指出：「布政司查議通詳，疑本朝之人未有從祀之例。」<sup>73</sup>此一制度性否決的背後，實則隱含著康熙朝對本朝當道儒者定位的審慎與戒備，或許是因朝廷唯恐過早開放本朝儒者入祀，會引發朝廷派學術派系在祀典話語權上的失控。

打破此一僵局的關鍵，在於雍正二年（1724）新帝即位的政治合法性危機。雍正帝奪儲爭議使其迫切需要拉攏漢族正統理學家以穩定人心，當時，雍正帝親詣太學釋奠先師，並詔令廷臣「詳考定議」<sup>74</sup>，審慎評估哪些賢儒應增入從祀。<sup>75</sup>在這次審議中，禮部尚書張伯行力陳陸氏之功<sup>76</sup>，從其「精研程、朱理學」、為官「以德化民」到其「端方孝友」的人品、著作為林，全面肯定其為「昭代醇儒」。雍正帝對此「甚合朕心」<sup>77</sup>，並依議從祀。雍正帝的「甚合朕心」，本質上是一場「帝王政治需求」與「儒臣學術派系」的權力交換：雍正透過破例恩准陸隴其從祀，向天下士子樹立了「朝廷尊崇絕對忠誠、嚴守綱常者」的政治態度，以此整飭因奪嫡事件而動搖的學術與政治風氣；而張伯行等朱學門徒，則藉由

<sup>68</sup> 宋榮（1634-1714），字牧仲，號漫堂。

<sup>69</sup> 許汝霖（?-1720），字時庵，號且然，浙江海寧硤石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進士，選庶吉士，曾督江南學政，整飭士風，性孝友，行謹飭，工於詩文。歷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後晉升禮部尚書兼禮部吏部。

<sup>70</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頁198。

<sup>71</sup> 從祀理由為陸氏「理學深醇，為本朝第一人」，期許其「位列先儒之後，祀從至聖之旁」，以彰顯正學並廣其影響。詳參〔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98。

<sup>72</sup> 徐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康熙十二年（1673）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遷中允，任日講起居注官。雍正元年署大學士，任《明史》總裁，諡文定。事蹟具《清史稿》卷289。

<sup>73</sup>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收入《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本），卷47。

<sup>74</sup> 以上引文皆出自《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sup>75</sup> 禮部等議：「周、漢、唐、宋、元、明外，本朝應增入從祀者一人。國家右文興教，凡務本力行之士，沐聖人之化，淬勵於天人性命之學者，實繁有徒。其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湖陸隴其為最。隴其自幼以斯道為己任，精研程、朱理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奏章必抒誠摯。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為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足稱昭代醇儒，允宜陪祀俎豆者也。」〔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99-200。

<sup>76</sup> 張伯行曾讚譽陸隴其「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為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為準繩。……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見〔清〕張伯行：《陸稼書先生文集·序》，《正誼堂文集》卷7，同治五年刻本。

<sup>77</sup>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

官方意志，成功將其學派先賢推向文廟，完成了對陽明心學及其他學派的制度性壓制。陸氏的入祀，正是清廷利用從祀名單型塑「理學即正統、正統即忠君」政治態度的典型範例。

值得注意的是，陸隴其從祀的動議，並非僅是張伯行個人的推動。據《文獻徵存錄》記載，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學者沈近思就曾上書其師熊賜履（1635-1709）<sup>78</sup>，主張應將學術純正、捍衛朱學的陸隴其從祀。<sup>79</sup>這段記載表明，陸隴其的從祀，實為當時學術界「尊朱」派系長期努力的結果。

陸隴其從祀孔廟的歷程，清晰地呈現了從地方推崇到國家認可的層次遞進。其入祀鄉賢祠與名宦祠，源於地方官員與士紳對其學問與政績的高度認可。而最終的從祀孔廟，則是在清廷全面改革祀典、雍正帝欲確立理學正宗的政治背景下，由張伯行、沈近思等朱學門徒長期倡議所促成。這段歷程證明，陸隴其之所以能於康熙朝未果、雍正初年成功，其原因並非單一因素，而是士林聲望累積、地方與中央官員持續推舉、雍正初年政治正統建構需求以及程朱理學官方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 四、湯斌從祀孔廟的歷史進程與評議

湯斌（1627-1687），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清順治九年（1652）中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其後歷任潼關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江西嶺北道布政司參政、翰林院侍講、《明史》總裁、江蘇巡撫、禮部尚書、詹事府詹事、工部尚書等職。在朝敢言直諫，不附權貴，曾謂「君恩高似天、臣心直如矢」，樹敵不少。康熙二十六年（1687），大學士明珠糾結黨人彈劾時任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的湯斌，湯斌遂被降五級留任，關於此段，黃宗羲〈皇清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潛庵先生神道碑銘〉、汪琬〈墓志銘〉中都有詳細記載。後方苞在〈湯潛庵先生逸事〉、〈湯司空逸事〉等文亦記述明珠構陷湯斌經過。同年九月湯斌改工部尚書，十月卒於任上，其友徐乾學「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sup>80</sup>。其生平事蹟見於《清史稿》卷 265、《清史列傳》卷 8、《湯中丞雜記》、《睢州湯氏

<sup>78</sup> 熊賜履（1635-1709），字靜修，號青岳，晚號愚齋，湖北孝感人。順治戊戌（1658）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端。

<sup>79</sup> 《文獻徵存錄》中推測沈近思通過影響其師熊賜履，使陸隴其最後順利從祀：「沈近思上書於孝感熊賜履，論孔廟從祀有未當者。其略曰：孔子之道，至朱子大明，朱子為繼述孔子大宗，同乎朱子者，即同乎孔子者也；異乎朱子者，即異乎孔子者也。明嘉靖以後，有與朱子歧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因破王守仁說，且論當陸隴其學術醇正，宜膺祀典。賜履得其書甚服之，其後隴其竟從祀孔廟，蓋近思先創其說。」詳見〔清〕錢林等：《文獻徵存錄》，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1995。

<sup>80</sup> 《觚剩續編》：「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褲。檢其所遺，惟竹筩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

家譜》。著有《洛學編》、《湯子遺書》十卷，為清初理學的重要代表。

### （一）湯斌從祀的學術基礎：兼綜朱陸的理學實踐

湯斌於兵燹流離中深切體認祖訓之重要，自述學術歷程，謂「幼聞祖父之訓，茫不知所為。及遭亂亡，頗悖家訓。鄉科遇復試之變，恐懼念過，思路窮絕，方悟家訓為至愛。此生非聖賢，無處放，又徘徊常說，終無入路。得陽明言以立根脚，但盡頭一步，又是蹊路不踏實地，卻用朱子作煞落。今揆之經書，乃合符矣。」<sup>81</sup>此語揭示其學術取向：以王陽明「致良知」為本，而以朱子之學為歸，實際上力圖調和朱陸之間的歧異。康熙年間，湯斌拜孫奇逢之門，據《洛學編續編》及〈墓志銘〉記載<sup>82</sup>，其學益臻成熟，踐履篤實，涵養純粹，被時人推為「一代巨儒」。湯斌之學並非純粹書齋理論，而重視性命之學與實踐功夫的結合，強調踐履與涵養，體現清初理學由性理義理向實際行誼轉化的風氣。

湯斌對王陽明「致良知」學說推崇備至，在〈志學會約〉稱「陽明先生致良知為聖學真脈」<sup>83</sup>，並盛讚其「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sup>84</sup>。然而他亦不盲從，曾指出「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救朱子末學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失其宗旨，致滋後人之議」<sup>85</sup>，並指陳晚明王門學者流於「儒而雜禪」，偏離人倫世務。相對而言，他認為朱子後學則過於沉溺於訓詁辭章，以功利之心為學，失卻程朱本義。關於程朱與陸王之間，湯斌曾與陸隴其有精彩討論，於〈答陸稼書書〉謂：「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今天下真為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為指南焉。」<sup>86</sup>甚至有辯駁如下：

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

<sup>81</sup> 湯斌：〈嵩談錄〉，《湯斌集》，頁1588。

<sup>82</sup> 《洛學編續編》：「後以父老乞歸里，聽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峰，受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篤實，涵養純粹，褒然推一代巨儒。」《洛學編續編》，頁538-539；〈墓志銘〉：「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遽，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湯斌集》，頁1792。

<sup>83</sup> 湯斌：〈志學會約〉，《湯斌集》，頁26。

<sup>84</sup> 湯斌：〈上孫徵君先生書〉，《湯斌集》，頁158。

<sup>85</sup> 湯斌：〈與田惺山書〉，《湯斌集》，卷5。

<sup>86</sup> 湯斌：〈答陸稼書書〉，《湯斌集》，頁189-190。

虧喪者，亦皆著書鏤版，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必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挾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許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抵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辟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sup>87</sup>

湯斌在與陸隴其往返書信中，展現其兼綜朱陸的立場。他一方面承認陽明「致良知」有矯正朱子後學流弊之功，另一方面又主張以朱子義理為落實之基。又如在〈答顧寧人書〉認為「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sup>88</sup>這種融通態度，使他既不同於陸隴其「尊朱黜王」的立場，也有別於晚明流於空疏的王學傳統。此外，湯斌在《洛學編》中編纂宋明理學家傳記，並兼顧漢唐經學傳統，呈現其「經道合一」的學術觀。此舉既保存理學正統，又促使理學與經學相互滲透，推動清初學術由義理學向經學考據過渡，為清代學術的新方向奠定基礎。

## （二）從賢良祠到文廟：政治實效與理學正宗的角力

湯斌的從祀進程，較陸隴其更為坎坷，歷經雍正、微調於乾隆、受挫於嘉慶、最終決戰於道光。這場長達近百年的湯陸並稱卻待遇有別的現象，暴露了朝野各方在「何謂儒學正統」以及「朝廷如何樹立政治標準」上的角力。

雍正十一年（1733）湯斌先入祀賢良祠，乾隆二年（1737），再蒙賜諡「文正」，並有御制碑文<sup>89</sup>。這表明在「名臣、清官、功勳」的政治層面上，中央早已給予最高肯定。然而，從象徵政治功臣的賢良祠，跨越到象徵萬世道統的文廟，卻觸動了清代祀典評選中最核心的道統判準敏感神經。

乾隆二年（1737）至四年（1739），禮部侍郎方苞與河南巡撫尹會一先後上疏請求湯斌從祀文廟。方苞試圖以「湯陸並稱」、「立朝大節」為湯斌辯護，甚至反駁士林對湯斌「雜取

<sup>87</sup> 湯斌：〈答陸稼書書〉，《湯斌集》，頁189。

<sup>88</sup> 湯斌：〈答顧寧人書〉，《湯斌集》，頁180。

<sup>89</sup> 楊椿：〈年譜定本〉，收於范志亭、范哲輯校：《湯斌集》（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2003），頁1781。

陸王」的指責。<sup>90</sup> 乾隆三年(1738)，河南巡撫尹會一因研讀真德秀(1178-1235)《大學衍義》，深感理學工夫之重要，遂於任內弘揚理學傳統。該年七月，讀到湯斌奉其師孫奇逢之命所做的《洛學編》，嚮慕孫、湯二人，「乃奉二先生秩於大梁書院」，並續作《洛學編》，增補孫奇逢、湯斌等七人。<sup>91</sup> 次年，他更正式上疏，為河南士紳李中振等所提之請求轉奏<sup>92</sup>，撰有〈題請湯文正公從祀疏〉<sup>93</sup>，具體倡議湯斌從祀文廟。尹會一指出，湯斌自少至老皆身體力行，不事浮言，雖著述不多，卻能「見道親切，踐履篤實」。對於批評湯斌「少著作」的質疑，尹會一辯稱此乃其「反躬實踐，不慕高遠」的體現，並以湯斌自言「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為非，何敢妄作」作為佐證。他進一步指出，湯斌所留著述多屬不得已之作，而其奏疏政議更是具體的「經國籲謨」<sup>94</sup>，足見其以理學之踐履服務政事。

然而，這波由理學官僚發起的嘗試，隨即遭到朝廷與保守派學者的聯手駁回。這場駁回的實質，如尹會一之子尹嘉銓(1711-1782)所言，在於湯斌「終不若陸隴其之著述如林」<sup>95</sup>。這暴露了清代中葉祀典制度對「道學正宗」的僵化堅持：在官方判準中，體現道統的學術著述被置於德行實踐之上。<sup>96</sup> 更深層的政治原因在於，乾隆朝正致力於消解地方漢人學者的經世結社，湯斌那種具有陽明心學色彩的學術傾向，並不符合乾隆帝對文廟從祀者必須是純粹的程朱傳道者的政治預期。

直到道光三年(1823)，通政司參議盧浙再度上疏，才突破僵局。他在〈請求湯斌從祀文廟疏〉中強調湯斌雖「著書尚少」，卻能「不言而躬行」，正符「聖門所貴」，可見其

<sup>90</sup> [清]方苞：〈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札子〉謂：「臣竊思湯斌實學躬行，與隴其相匹，而立朝大節，則尤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講學之書，雖宗朱子，而亦間取陸王，殊不思陸王之身已從祀孔廟，而乃以議斌，義無所處。」見氏著：《方苞全集》，第八冊《方望溪文集全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頁165。

<sup>91</sup> 除了孫、湯二人，尚增補耿介(1622-1693)、張沐、張伯行(1651-1725)、竇克勤、冉觀祖(1638-1719)。

<sup>92</sup> 節錄奏議如下：「生李中振等公懇將湯斌從祀文廟前來仰請。天恩俯允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志……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乾隆四年六月日奉旨：九卿議奏，欽此。」

<sup>93</sup> 尹會一：〈題請湯文正公從祀疏〉，《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78-79。

<sup>94</sup> 尹會一：〈洛學編續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0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540-541。

<sup>95</sup> 《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頁350。

<sup>96</sup> 湯斌的遭遇並非孤例，自東漢鄭眾、盧植，以至晉代范甯，雖專精經學，卻偏於訓詁章句，被認為是「字裏行間之經」，而非「道德性命之經」，因而未能入祀。同樣，唐代陸贄(754-805)與北宋韓琦(1008-1075)，皆以名臣著稱，立身以正、事君以誠，功勳昭著，卻因缺乏體現「道統」的學術著述，而不得從祀。由此可見，對湯斌從祀的阻力，固然與政治因素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仍在於祀典制度對「道學正宗」的堅持。相關資料可見[清]唐鑑：《學案小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德行之科所以先於文學」<sup>97</sup>。此說獲得劉逢祿與禮部尚書汪廷珍(1757-1827)支持<sup>98</sup>，奏請准予從祀。劉開(1784-1824)亦致書汪廷珍，稱魏象樞(1617-1687)<sup>99</sup>、湯斌、李光地(1642-1718)等皆「言必本躬行，學必求致用」，其學「有資於世用」<sup>100</sup>，能維持風教，與理學宗旨並不相悖。汪廷珍進一步指出，湯斌等人或以行誼風節著稱，或以文章學問顯聞，雖造詣不一，純駁有別，但皆可作為世道人心之標準。<sup>101</sup>玉麟(1766-1833)上〈再請湯斌從祀文廟疏〉，更謂湯斌「與陸隴其相等而事業過之」<sup>102</sup>，政績如毀淫祠、移風易俗、減免賦稅，足為經世之效；其學則「堅苦自持，事事講求實用」<sup>103</sup>，尤顯踐履之功。最終，道光帝下旨，明言從祀湯斌乃為「崇實學而闡幽光」<sup>104</sup>，利用從祀名單的更迭，向全國士大夫發出明確的政治信號：朝廷此時需要的不再是死守程朱訓詁、著述如林的書齋學者，而是需要像湯斌一樣，能將理學工夫轉化為「整飭地方風俗、解決財政民生」的經世實幹官僚。

### (三) 經世致用風氣對祀典正統的重塑

全祖望(1705-1755)曾言湯斌是「天下之人皆以為當從祀者」<sup>105</sup>，嚴繩孫(1623-1706)亦推許其為「吾一生所見真道學，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一人」<sup>106</sup>。士林對湯斌的高度評價，往往集中於其德行與事功，而非學術著述。這與湯斌以陸王心學為入手，繼而調和朱陸之說的學術立場有關。由於雍正朝以程朱理學為「行道之儒」的正統標準，湯斌既不以傳經著述為長，亦不完全符合程朱純正體系，因此在爭取從祀過程中，朝臣與士人往往必須刻意凸顯其德行踐履與政績實效，以淡化其「非正宗」之學術身份。<sup>107</sup>

<sup>97</sup> 相關內容可見《清實錄》正編第14冊《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

<sup>98</sup> 劉逢祿覆議：「後變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見《清史稿·儒林傳三》，頁17。

<sup>99</sup> 魏象樞(1617-1687)，字環極、一字環溪，號庸齋，直隸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敏果。見徐世昌：〈環溪學案〉，《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62)，第1冊，卷20，頁1。

<sup>100</sup> 上述引文見於劉開：〈上汪瑟庵大宗伯書〉，《劉孟塗集》卷4，《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10冊，1995，頁354-356。

<sup>101</sup> 汪廷珍：〈復劉君孟塗書〉，《實事求是齋遺稿》卷4，《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50冊，頁468。

<sup>102</sup> 玉麟：〈再請湯斌從祀文廟疏〉，收於范志亭、范哲輯校：《湯斌集》(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2003)，頁1866。

<sup>103</sup> 玉麟：〈再請湯斌從祀文廟疏〉，《湯斌集》，頁1866。

<sup>104</sup> 〈道光皇帝同意湯斌從祀文廟諭旨〉，《湯斌集》，頁1867。

<sup>105</sup> 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307。

<sup>106</sup>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6，頁435。

<sup>107</sup> 相關討論可見黃濤：〈試論乾隆至道光年間湯斌的形象建構〉，《國學學刊》第1期，2018年，北京，頁136。文中討論湯斌這位河南理學復興的重要人物在後世的影響，以他的從祀歷程和唐鑑《學案小識》等傳記資料對他的書寫為中心，分析後世儒者如何基於自身處境、學派立場以及因應朝廷需要，塑造湯斌形象；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收於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實業文化有限公司，1994)，頁286-289。

清廷以程朱理學為正統，而湯斌自言「得陽明言以立根腳，而以朱子作煞落」，其實乃調和朱陸之舉。這樣的立場如何納入祀典？唐鑑(1778-1861)<sup>108</sup>的《學案小識》提供了重要觀點。該書成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將湯斌置於「翼道學案」之首。此「道」專指程朱理學，顯然是將湯斌定位為理學正統的輔翼。唐鑑強調湯斌與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宋儒的聯繫，指「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為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力行之，雖為聖人無難』」<sup>109</sup>，乃傾向程朱。唐鑑強調湯斌「尚力行，不尚講論」，觀其「事君臨民」，即可知其學「所得者深且粹」。換言之，唐鑑承認湯斌在文字論述上不及陸隴其，但其「潛心聖賢之學，以誠正為本，以忠孝為先」<sup>110</sup>，正是程朱理學精神的踐履者。

湯斌之所以能在祀典討論中被不斷推崇，正在於其人既有直言敢諫的立節，又有躬行踐履的學術實踐。因此，湯斌的從祀不僅是對其個人道德與政績的肯定，更是清廷藉此重新塑造理學權威，象徵著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政治需求與士林輿論的共識如何塑造了儒家正統的內涵。

## 五、結論：陸隴其與湯斌從祀孔廟比較

陸隴其自雍正二年（1724）經欽定從祀孔廟，而湯斌則遲至道光三年（1823）方得優入聖域，二者相隔近百年。這一時間上的巨大落差，若僅從二人在儒學思辨上的優劣來評制，往往會陷入純學術論的盲區。實則，孔廟祀典作為清代意識形態建構的核心儀式，名單的增黜本質上是帝王文化政策、學術派系角力與時代現實需求三方共謀與協商的結果。綜合本文研究，獲致以下三點核心觀察：

### （一）從「衛道醇儒」到「經世循吏」：清代官方理學範式的轉移

陸隴其、湯斌二人從祀的時間差，清晰地勾勒出清代前中期官方理學正統由「強調學術純粹性」向「兼容經世實用性」的範式轉移。陸隴其卒後僅三十餘年即迅速入祀，正值雍正帝奪嫡登基、政權合法性面臨危機之際。此時朝廷的當務之急是透過拉攏嚴守過程、劃清王學界線的尊朱派官僚，來穩固政治綱常。陸隴其著述如林且激切衛道的形象，恰好成為朝廷構築思想防線、整飭天下士風的標準。相較之下，湯斌的入祀雖在乾

<sup>108</sup> 唐鑑（1778-1861），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進士。仿《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將清代講學諸儒分立為五學案：《傳道學案》、《翼道學案》、《守道學案》、《經學學案》、《心宗學案》。

<sup>109</sup> 《睢州湯先生》，頁348。

<sup>110</sup> [清]唐鑑：《學案小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351。

隆朝屢次由方苞、尹會一等人提請卻均遭駁回。其時清廷面對「天理教事件」後的思想與社會震盪，文化政策亦由乾嘉以降的漢學考據轉向理學化。此一轉折，使得湯斌等人得以被重新定位，最終受祀孔廟。二人從祀的時間差異，正反映清代前中期文化政策與意識形態調整的不同背景。

## （二）官方與士林的評價傾向

陸隴其與湯斌雖同為清代從祀孔廟的理學名臣，但二人的入祀歷程與官方、士林的評價傾向並不相同。陸隴其自康熙、雍正以來即深受朝廷推崇，至乾隆朝更獲清高宗稱許其「研精聖學，辭闢異端」，譽為「一代醇儒」<sup>111</sup>，充分展現官方對其程朱理學立場的肯定。其與魏了翁、何基、黃榦等程朱學者同列從祀，而戴聖、何休等漢儒則遭排除於外，亦可見清廷透過祀典制度，有意彰顯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正統的學術地位。<sup>112</sup>

相較之下，湯斌的學術定位在士林間始終存在不同評價。乾隆初年，汪由敦雖極力主張湯斌應與陸隴其、李光地等人一同從祀，以「昭代理學之倡」，但仍不得不回應外界質疑其「近於陽明之學」的批評，指出：「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為其說者也。」又認為王陽明既已從祀，不應因此否定湯斌的理學地位。此番辯護正反映湯斌雖具高度政治聲望，其學術歸屬卻未如陸隴其般獲得一致認同，從祀問題亦因此延宕多年。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初年朝廷強調的是「踐履篤實」與「經世實功」，然而符合此一特質者並非僅有湯斌一人。若僅以經世實踐而論，陳瓚、陸世儀、顧祖禹等清初名臣亦皆具備相當聲望。然最終獲得從祀者卻是湯斌，其原因正在於湯斌兼具多重政治與學術象徵。

湯斌歷任禮部尚書、工部尚書等要職，不僅具有崇高官位，更以清廉剛正、關心民瘼聞名，長期享有官場與民間的共同聲望。再者，相較於顧祖禹偏重地理兵學、陸世儀主要從事民間講學，湯斌兼具理學名臣與經世官僚的雙重身分，更容易成為官方塑造理想官僚典範的象徵人物。因此，道光朝選擇湯斌，不僅是在表彰其個人德行，更是藉由孔廟祀典宣示整頓吏治、提倡務實行政的政治取向，使理學精神與經世實踐結合為新的官方典範。

綜合而言，陸隴其與湯斌雖同樣躋身孔廟從祀名單，但二人的入祀模式具有明顯差異

<sup>111</sup> 以上兩段引文出自〔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

<sup>112</sup> 與陸氏同年從祀者有復祀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增祀者二十人：縣宣、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有尹焞、黃榦、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隴其。詳參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中國禮樂學會，1977年），卷1，頁9-10；卷2，頁11-13。就增祀者而言，尹焞、黃榦、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隴其應可視為程朱理學家，至於魏了翁則與朱熹及其門人有所往來，亦與陸九淵之子陸持之論學，融合理學與心學。

。陸隴其憑藉鮮明的程朱立場與衛道形象，較早獲得官方與士林一致肯定，其從祀可視為清廷建立理學正統的重要象徵；反之，湯斌則歷經長期論辯，其從祀並非單純依據學術著述，而是在士林持續強調其「踐履篤實」與「經世實功」後，逐漸獲得朝廷認可。

因此，湯斌從祀的曲折歷程，反映出清代孔廟祀典的評議標準，並非僅取決於理學思想是否純粹，更涉及學術立場、德行實踐與政治需求三者之間的權衡。朝廷最終將湯斌塑造成兼具理學精神與經世實踐的代表人物，使其雖曾被質疑帶有陸王學風，仍得以納入程朱正統的脈絡之中。由此可見，清代孔廟從祀制度不僅是對個別儒臣的歷史評價，更是國家藉由祀典制度建構儒學正統、引導士風與宣示政治價值的重要機制。

### （三）入祀背後的政治操作與學術論述

清代從祀制度既象徵尊儒崇道，亦為王朝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機制。陸隴其生前未居顯赫仕途，然卒後三十餘年即得從祀孔廟，顯示其入祀並非單憑個人名望，而與清廷在雍正初年整飭學風、確立程朱理學正統的政治意圖密切相關。陸隴其自我定位為程朱道統的堅定守護者，強調「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sup>113</sup>，甚至將不尊朱子視為「儒學異端」<sup>114</sup>。其以嚴厲筆鋒批判陽明心學<sup>115</sup>，指責其空疏之弊導致明亡，主張返本開新、撥亂反正。此等論述不僅為清廷建立官方學術體系提供正統論證，也契合其以道統重塑統治秩序之需求。此外，陸隴其尤重躬行踐履<sup>116</sup>，主張理學學習須表現在日常行誼與德性砥礪上，實現學術醇正與風俗澄清，與清廷強調經世致用、以教化維持社會秩序的治理方針相互呼應。

然而，同為朱子學信徒且對陸隴其思想有啟發作用的呂留良（1629-1683）卻未獲入祀。康熙十七年（1678）徵召博學鴻儒時，呂留良「自誓必死」以拒仕，詩文中多見遺民心態與反清意識，其政治立場與清廷意識形態嚴重牴觸。相較之下，陸隴其在《三魚堂日

<sup>113</sup> [清]陸隴其：《三魚堂外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148-149。

<sup>114</sup> [清]陸隴其：《松陽講義》（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頁4。

<sup>115</sup> 《清儒學案》謂陸氏「端居獨學，以濂洛關閩為聖學正軌，身體力行，排斥陽明尤不遺餘力。」詳參[清]徐世昌著，楊家駱編：《三魚學案》，《清儒學案》（台北：世界書局，1979），卷10，頁1。另則，陸隴其在〈學術辨〉、〈周雲糾先生四書集義·序〉等文中痛徹反思明亡的歷史緣由，把陽明學和明代的盛衰興亡聯繫在一起，激烈地批判陽明學空疏的流弊和危害：「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效也。每論啟、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為今之學非尊程朱而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為怪。」[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402。

<sup>116</sup> 陸隴其曾謂：「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為誠意，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為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詳參[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記》中多所讚頌康熙，展現擁護王朝之姿。<sup>117</sup>由此可見，清廷於甄擇從祀人選時，政治忠誠與道統態度往往優先於純粹學術成就。值得深入探究之關鍵問題在於：陸隴其承襲並引用呂留良理學思想，是否對其入祀資格構成阻礙？事實上，陸隴其對呂學之承繼屬「道德理學」面向，而非「政治抗清」層面。他吸收呂留良所倡導之「居敬窮理」、「修身為本」理念，強調道德實踐與學術規範，卻抽離其遺民意識與夷夏之辨等政治立場。換言之，陸隴其在思想上承繼呂留良之理學精神，卻主動與其反清情緒切割，完成思想與政治的再詮釋與過濾，使其能符合清廷所需之正統儒者形象。

雍正二年(1724)議定陸隴其從祀時，禮部奏疏主要肯定其學宗程朱、操履醇正、清廉愛民等特質，並未提及其與呂留良之間的學術淵源。此一現象與其說反映官方刻意將陸隴其去政治化，毋寧說是當時從祀審查標準著重於儒者的學術正統、道德實踐與教化功能，故奏疏選擇以符合國家理學典範的論述方式建構其形象。至於雍正十年(1732)曾靜案<sup>118</sup>爆發後，呂留良始被官方定性為反逆人物，乃屬後來的政治發展，不宜據此反推雍正二年的從祀決策。然而，曾靜案之後，陸隴其並未因與呂留良的師承關係而受到重新評議，反而仍維持其從祀地位，顯示清廷已將其定位為代表程朱理學正統的典範儒者，其官方形象具有相對獨立性。

與陸隴其從祀的強烈政治色彩不同，湯斌的從祀則反映了清廷中後期文化政策的調整。湯斌在世時官至高位，以廉潔、政績卓著聞名。他的從祀發生於鴉片戰爭前夕，清廷內憂外患之際，需要藉由表彰經世致用的官員來提振士氣、挽救頹勢。這體現了清廷從單純的學術正統轉向了對實學與道德楷模的價值重估，其典範意義更多是順應清中葉文化政策調整的產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陸、湯二人的學術異同做了精闢的總結<sup>119</sup>：陸隴其「篤守程朱」，「攻擊陸王」；湯斌則「根柢在姚江」，「能持新安、金溪之平」。儘管兩人學術路徑不同，但最終都歸於「刻勵實行」與「講求實用」。然而，單純的學術差異並不足以解釋兩人從祀時間的巨大落差。陸隴其的從祀是官方主導、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舉動，其核心意義在於正名與權力宣示，藉由確立醇儒典範，為雍正朝的統治提供儒學正統的合法性。相

<sup>117</sup> 諸如「朝廷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性最寬大，最聰明。所望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者，則惟在勇斷耳。」〔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59。

<sup>118</sup> 相關資料可見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年，頁61-89；王俊義：〈雍正對曾靜、呂留良案的「出奇料理」與呂留良研究—文字獄對清代思想文化發展之影響〉，《淡江史學》第11期，2000年，頁135-150。

<sup>119</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73〈別集類·第二十六〉，頁4524。

對地，湯斌的從祀則是時代需求的體現，其意義在於教化與挽救時弊，旨在為清朝統治者提供一個廉吏楷模，以應對日益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危機。透過對比兩者的從祀過程，或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清代統治者如何根據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政治需求，靈活地詮釋與操作儒學正統。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方苞：《方苞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 〔清〕吳光西、郭麟、周梁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清〕李光地：《榕村全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 〔清〕陸隴其：《陸子全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
- ：《松陽講義》，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
- ：《松陽鈔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三魚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湯斌，范志亭、范哲輯校：《湯斌集》，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
- 〔清〕徐世昌著，楊家駱編：《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
- 〔清〕唐鑑：《唐鑑集》，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
- ：《學案小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清〕藍鍾瑞等纂：《孔子文化大全·史志類·文廟丁祭譜》，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
-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臺北：中國禮樂學會，1977年。
- 〔清〕孫奇逢：《理學宗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劉源淶：《讀書日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26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年。
- 〔清〕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清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大清會典則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欽定禮部則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欽定大清通禮》，吉林：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

《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二) 近人專著

〔美〕羅威廉 (W.Rowe)：〈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清史研究》，第3期，2012年8月，頁150-156。

〔日〕三浦秀一：〈湯斌と陸隴其—清初士大夫の人間理解と經世意識〉，《文化=Culture》第48期，仙台：東北大學文學會，1984年，頁74-9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2013年。

王佳：〈陸隴其心性論簡說〉，《文學研究》第38期，2021年，頁27-29。

王俊義：〈雍正對曾靜、呂留良案的「出奇料理」與呂留良研究—文字獄對清代思想文化發展之影響〉，《淡江史學》第11期，2000年，頁135-15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與義涵〉，《清華學報》第24卷第4期，1994年12月，頁451-494。

丘文豪：《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21年。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心知三聯書店，2015年。

朱淑君：〈系譜重建與經世復歸：咸同時代理學復興的學術特徵考察〉，《文藝評論》第2期，2011年，頁158-161。

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李紀祥：〈清代學術之「開端」〉，《漢學研究》第29卷第3期，2007年9月，頁283-316。

李國祁：〈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

，1986年12月，頁17-65。

李細珠：〈略論道咸同時期的理學復興及其原因〉，《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8年，頁99-104。

車冬梅：〈析晚清理學學術特徵〉，《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2009年7月，頁48-51。

車冬梅、劉欣：〈析晚清理學之程朱陸王之辨〉，《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1期，2010年1月，頁65-69。

呂妙芬主編：《明清思想與文化》，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

呂妙芬：〈清初河南的理學復興與孝弟禮法教育〉，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77-223。

余龍生、張文革：〈清初理學名臣陸隴其的治政思想評述〉，《朱子學刊》第1輯，2004年，頁323-331。

吳麗娛主編：《禮與中國古代社會》（明清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吳旺海：〈學術競逐與帝王心態：清儒陸隴其從祀孔廟蠡探〉，《朱子學研究》第40輯，2023年。

何佑森：〈明末清初的實學〉，《臺大中文學報》第4期，1991年6月，頁37-51。

何淑宜：〈清初河南理學家與地方秩序的恢復〉，《明代研究》第22期，2014年6月，頁77-107。

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年，頁61-89。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孟祥才等：《曲阜廟城與中國儒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周啟榮著，毛立坤譯：《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倫理道德、儒學經典和宗族為切入點的考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周積明、雷平：〈清代經世思潮研究述評〉，《漢學研究》第25卷1期，2006年2月，頁1-10。

———：〈清代學術研究若干領域的新進展及其述評〉，《清史研究》第3期，2005年8月，頁109-124。

胡億紅：〈晚清「海內三賢」論議〉，《歷史教學》第24期，2008年12月，頁47-50。

孫經超：〈陸隴其配祀文廟探析〉，《文化學刊》第7期，2017年7月，頁207-210。

晉聖斌：〈陸隴其理學思想述評〉，《中洲學刊》第2期，1994年，頁75-78、頁29。

- 唐屹軒：《清嘉道咸時期士人的時代關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 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張麗珠：《清代新義理學》，臺北：里仁，2003年。
- ：《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
- 張天傑：《尊朱辟王思潮與明清學術轉型：道、學、政之間的程朱陸王之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
- 張天傑、蕭永明：〈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闢王」思潮中一條主線〉，《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3期，頁116-123。
- 張晨怡：〈清道光年間理學士人在京交游述論〉，《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5年，頁89-93。
- ：〈略論清同治年間的理學復興〉，《歷史檔案》第2期，2006年，頁88-91。
- 張循：〈清代中期的「文士」與「文章」——讀章太炎《煊書·清儒》篇書後〉，《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7期，2017年6月，頁141-176。
- 張瑞龍：〈清中葉嘉道年間學術思想史研究總述〉，《漢學研究通訊》第27卷第4期，2008年11月，頁1-11。
- ：〈學術、政治與元明理學史的重建——朱鴻林教授「孔廟從祀」系列研究讀後〉，《中華文史論叢》第128期，2017年4月，頁369-390。
-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頁53-111。
- ：〈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學海》第2卷，2015年4月，頁186-204。
-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問題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頁475-484。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梁健聰、楊兆貴：〈從「明道」到行道——以嘉慶、道光年間文廟從祀為中心的考察〉，《人文論叢》第1輯，2014年，頁140-150。

陳戌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陳治維：〈近四十年臺灣學界研究清儒義理思想舉要論述〉，《興大人文學報》第52期，2014年3月，頁177-224。

鹿博：《晚明清初儒學轉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

馮振亮：《清代祀孔典制變遷的歷史考察》，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8年。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利、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4年。

——：《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2016年。

楊朝亮：《清代陸王心學發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楊菁：《李光地與清初理學》，新北：花木蘭文化，2008年。

——：《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盧鍾鋒：〈論道咸以來的文化走向與傳統學術史的編修〉，《中國史研究》第3期，1996年，頁43-5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

——：《朱子新學案》，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

嚴佐之：〈「朱陸異同」歷史文獻與「朱陸異同之辨」歷史衍變〉，《中華文史論叢》第130期，2018年2月，頁149-206。

龔書鐸主編：《清代理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

